

文学思潮

理论 | 方法 | 视野

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若干问题

席扬 著

Theory

View

Method

上海三联书店

文学思潮

理论 方法 视野

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若干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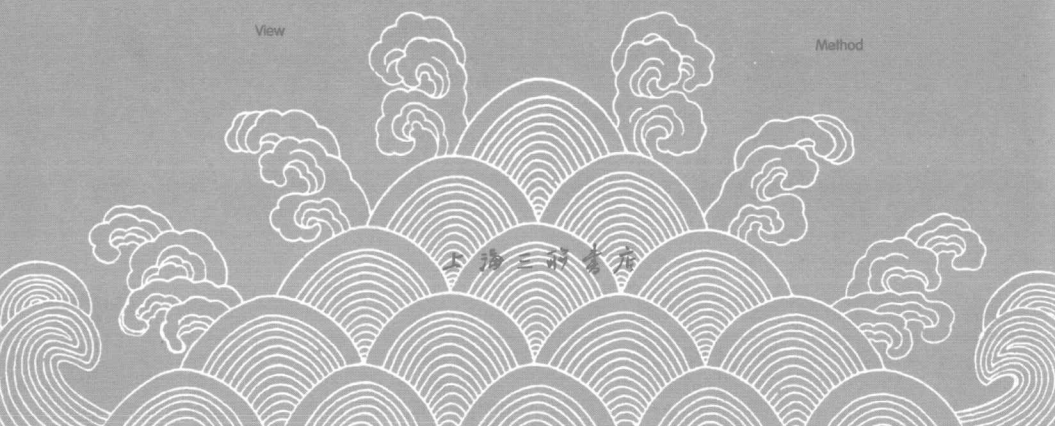
席扬 著

Theory

View

Method

上海三联书店

A decorative pattern at the bottom of the book cover, consisting of stylized, overlapping waves or clouds in a light gray color,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思潮:理论、方法、视野——兼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若干问题/席扬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1

ISBN 978 - 7 - 5426 - 2912 - 8

I. 文… II. 席… III. 文艺思潮—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9.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9660 号

文学思潮:理论、方法、视野

著 者 / 席 扬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熊小凡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80 千字

印 张 / 11

ISBN 978 - 7 - 5426 - 2912 - 8/I · 403

定价:28.00 元

绪论 “文学思潮”的“问题”与“意义”

当我们把“文学思潮”作为“问题”置于学理层面加以省察时，它的范畴指涉和存在样态的复杂性是不容忽视的。长期以来，它始终被两类基本的研究主体所关注——一类是文艺学学者，另一类为文学史家（包括文学现象的即时评论者）。诚然，这两类学者在他们的研究实践里对“文学思潮”的关注，因为学科的某些稳定的规定性使得“文学思潮”作为问题的独立性并不突出，甚至于常常被熔融于一些具体对象中而难以察觉，但它始终是“在场”的，而且又常常并不仅仅隶属于某一具体问题或现象。它的“存在性”，与其说是“问题”范畴，不如看成“方法”领域更为合适。“文学思潮”作为一种指称，与众多的有关文艺的指称概念一样，其内核和边界的清晰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任何指称在不同的逻辑范畴和言说语境中，都可能或必然地使人对之产生不同的意会。这样说，既是一种逻辑常识，又是我们研究“文学思潮”时经常遇到的情形。比如，我们单凭简单的判断就可以认同这样一个结论：“文学思潮”在文艺学里与在文学史中并不是一回事。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而是个大问题。因为，“文学思潮”的“问题性”就隐藏在这一“简单”之中。

问题一：“文学思潮”是“文艺学”的对象，还是“文学史”的现象？

“文艺学”和“文学史”两个学科有明显差异，应当说是众多研

研究者容易感知的。然而这种容易被感知的“差异”常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被运用时却常常变得“陌生化”了。从以往大量有关“文学思潮”的研究成果来看，它的“特性”与“文艺学”学科并无多大关系。“文艺学”在自己的学科体系里，长期以来不仅漠视它，而且一直坚执地拒绝着对“文学思潮”进行任何形式的深入阐释。比如，据笔者粗浅的浏览与查阅，“文学思潮”作为概念及其解释，基本上只是“辞海”或“文学词典”一类工具书的职责，众多或新或旧的“文学理论”教科书，都统一性地放弃对“文学思潮”实施概念界说和学理推导。^[1]

这些无疑表明，“文学思潮”应当属于“文学史”学科。事实似乎“确乎”如此。仅就“文学思潮”的“概念界说”而言，这一“重任”大都被文学史家（更多的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者）所承当。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冠以“思潮”之名的“史论”和“现象论”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有数十部之巨。此类著述的大多数，一般会在“绪论”或“导言”部分对“文学思潮”的概念进行定义——不过，种种“定义”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可参阅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同时我们也看到，实施“定义”的主体似乎并不借重于任何理论资源，毋宁说是常常凭着感觉——而这一感觉又是与其所要考察的对象及其对象特性的“预设”紧密关联的。文学史家所面对文学研究对象的实践性特征和现象性特征，总使得其在对“文学思潮”概念进行定义时不能不频频回首于文学现象的“历史样态”，他在顾及“历史逻辑”的同时就不能不淡化“学理逻辑”所带来的制约与限定。这显然是悖论！更重要的是，这一“悖论”在文学史家对“文学思潮”粗浅的理论思考中被轻轻放过了。来自于“历史逻辑”的“自圆其说”的“定义”，又以其“自圆其说”性能作用于对文学历史和现象的具体论述。因为“定义”被质疑的可能性的缺位，必然导致文学思潮研究的“无当”与“泛化”。

其实，文艺学并非不屑于把“文学思潮”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而是也同样有着上述“悖论”所带来的困惑。比如当我们预设“文学思潮”的研究重心应当是“观念”的运动过程——这一命题显然更多具有着“文艺学”学科属性。其实,这样的研究至今仍然是许多著述中有关文学思潮研究的常见形态。近年来,有许多文学史著作,有意把以往的“文学运动”或“文学过程”内容,更名为“文学思潮”。论述所囊括的具体内容多属于“观念”性的东西——着力关注的是“理论争鸣”事件和理论性文献,具体的大量的文学创作,常常是理论或观念演变梳理过程及其必然性、合理性的证明材料。其实,这里面深藏着不少不可轻视的谬误。文学史视野中的理论(观念)文献,一般并不包括同一时期那些与实际的文学创作无太大关联的“纯粹”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有关的理论样态,不仅仅“批评”类型居多,而且任何理论只有转化为批评才可能有效地进入文学史视野。在具有自恰性的理论看来,“批评”的展开,随时都可能发生因对象(创作)的特定性而导致的“变形”“误读”或“曲解”,这种情形自然无法满足理论的期待,“文艺学”把“文学思潮”排除在外,亦属当然。坚守理论自身的“自恰”,必然遮蔽大量的“批评”所隐含的某一理论(观念)的运动信息。其结果是,“理论”与“批评”实际也就是“文艺学”与“文学史”,彼此成为“他者”。

由此看来,“文学思潮”应当是一种结合着“文艺学”和“文学史”才能有效展开的研究。

问题二:“文学思潮”是宏观地把握,还是微观的透视?

一般而言,“文艺学”和“文学史”本质上无疑是宏观的。结合着两者才能有效展开自身研究的“文学思潮”,应当说更倾向于宏观。“文学思潮”研究的“宏观性”,既受制于它的对象世界——文学的任何个别领域如创作、批评、理论、传播与接受等,都不足以承当文学思潮的对象性。文学思潮的对象是一个相对独立时期的文学的整体存在,是历史存在的全部。它所呈现的是“文学”的思潮,而不是被类型化、领域化或进行了条块分割后的文学的各个侧面。

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文学史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文学思潮”的“宏观性”也来源于它的观照方式——这自然是与它的“整体性”范畴特性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不同的文学领域(创作、批评、接受),文学思潮在考察时是在对他们进行“现象化”处理的基础上,要捕捉的是大量现象背后的“倾向性”即“同一观念”及其这一观念的流程。“现象”的纷繁性与“观念”的单一性的结构机制,正是文学思潮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学者明确指出:“文学思潮是时代文学思想中十分活跃因而引人注目的部分,集中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某些突出方面。在文学的世纪发展中,思潮也许可算是个纲。将文学思潮真正研究清楚,会使文学史上许多问题迎刃而解。”^[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整体的“文学思潮”研究不仅可以弥补文学史研究的某些不足,而且同时能够满足人们对文学史的深层期待。比如,当文学史有意从“观念运动”角度来梳理自身历史时,文学的“思想史”状态就可能被更清晰地展示出来。也因此,文学的研究便会获得走出文学的机遇,不仅能使特定时代文学的思想及其演变成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的有效构成部分,而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复杂关系可能得以在特定“思想”的整合中显现其独有的文化意义。

诚然,“文学思潮”研究的“宏观性”有着不同的甚至是多样的具体呈现方式。《中国现代文学主潮》^[3]《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4]等著述只是一种常见的文学思潮书写方式,而大量的却如同《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5]《政治文化与中国 20 世纪三十年代文学》^[6]等著述一样,显然属于文学思潮“宏观性”研究的别样书写。《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主要考察“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其讨论的重心实际坐实于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主义”是如何在中国现代的文学领域中播衍与接受表达的。《政治文化与中国 20 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显然是把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政治化”作为一种思潮,阐释的充分性体现为对“政治文

化”之于 30 年代文学样态、文学政治化的审美体现等复杂性的揭示。这些著述的研究共性表现为,首先是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观念”及其作用的认可。其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还原它的历史流程——主要是某一观念被审美化表达的式样和“观念”影响下的创作主体姿态、精神、写作行为的种种变化。其三是文学的历史在某一种“观念”吸附中被加以重新组织,呈现新的文学史的历史叙述。我们知道,导致文学史叙述变化的可能性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观”的变化,即“如何看待历史”的观念变化;二是对“决定历史面貌”的不同“因素”及其作用的强化与凸显。而“文学思潮”“宏观性”研究中的文学史的别样表达,应该是或者更接近于上述第二种情形。

“文学思潮”的“宏观性”并不是一种限制,在文学研究的实际展开过程中,“文学思潮”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状态有其特殊性。无论如何,“文学思潮”不会也不可能拒绝和彻底排除“微观”的介入,只不过它对于微观的接纳有着自己的方式而已。比如设定从“观念运动”角度考察某一时期的文学,研究主体对“主流观念”的体认和在“主流观念”统辖下对文学史现象的取舍,相对于文学整体而言显然是一种“微观”——在这里又进一步显现了“文学思潮”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区别。“文学思潮”的“微观性”也还大量体现在具体的分析中。比如对 20 世纪 30 年代“革命文学思潮”的讨论,不仅需要“革命文学论争”的“微观事件”进行深入辨析,同时必须对“革命文学创作”和“准革命文学创作”实施细密的文本解读。“思潮”的宏观与“现象”的微观就这样被相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过,这种“微观”,毕竟是“宏观”临照下的对象,它也不可能走向那种为呈现历史全貌而进行的现象还原式研究。

问题三:“文学思潮”研究是一种结构程式,还是一种方法?

这是以往“文学思潮”研究中从未引起注意的问题——而它却是“文学思潮”范畴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说“文学思潮”是一种结

构程式,意指作为“观念史”研究,文学思潮不能不对文学历史或当下文学发展过程中“观念”形态(抽象的思想形态)的各种直接间接的表征予以分外关注。它的研究预设总是在观念运动的空间里确立自己的视野,视野的特定性不仅规限了叙述方式,也同时给定了具体内容的取舍标准。同一现象,在文学史视野与其在文学思潮视野中的影响、功能、作用有着很多的不同。这显然取决于“文学思潮”和“文学史”那些各自不同的具有恒定性的结构状态。比如“五四文学”,不论是对其生发缘由的“外倾性”肯定,还是强调当时时代知识分子先锋群体的自觉性,都是以五四时期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作为考察对象的,即文学史价值结论的最终确立来源于历史属性。文学史表述中过分的对历史的观念化处理,必然会降低它的可信度,因为,文学史毕竟属于“历史学科”。而作为“思想史”属性的“文学思潮”研究,“信”与“非信”的差异并不是要害。它首先要求研究主体必须确认各种观念共生夹缠中的主导观念,即呈现为文学整体性的“思潮”(而绝不是文学的某一领域的主导观念)。然而,我们看到,不少有关“五四文学思潮”的著述却有着不少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是怎样形成的?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文学思潮”对于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状态的观照是侧重于“思想史”方面的。比如从社会文化走向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角度看,“五四文学”整体性地凸现着“启蒙”性——启蒙,既表现为统一性的文学功能,又表现为创作主体的文化姿态,还大量渗透于文学的诸多形式方面。为此,以“启蒙主义”来命名五四文学思潮,应当说是恰当的;如果我们关注到五四文学基本观念等本体方面对西方近代以来进步思想的广泛吸纳,并且在对中国传统批判中所建构起来的“元话语”状态,我们把“五四文学思潮”称之为“西方化思潮”也未必不可。当有人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创作观念来定位五四文学思潮的属性时,自然也有它合理性的一面。但这里依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所说的文学思潮的“观念”与“思想”,其实

不能仅仅理解为“有关文学”的思想,而是“如何看待文学”的思想,即有关文学与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念。这决定了文学的整体性变迁。说白了,“文学思潮”对于文学历史进行的“思想叙述”,不是还原,而是阐释,它可以为文学的价值更新提供多种的可能性。

这无疑就探进到“文学思潮”作为“方法论”的层面。

作为“方法”的“文学思潮”研究,应当是指它的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作为一种视野的基本原则及其策略选择。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语境研究,语境与修辞的关系研究,作家独创性的问题和审美风格变迁研究。

当我们通过深入了解感觉到某一历史时期确有一种整体性的“文学思潮”的时候,它便成为我们重新进入此一阶段文学的一种新的视野。原来林林总总似乎没有头绪、彼此夹缠的现象,被发现其实是由某种很强大的具有结构性的“框架”所整合,自有其“有机性”和存在秩序。我们进而还能够发现,作为构成整体的因素的任何“单体”(包括人和事件等),在这一“框架”里并没有足以和整体相抗衡的“主体性”,“思潮”必然对它发生影响——不论是正面的认同或是反向的调整。比如就一个作家的历史前后看,任何人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变化如封闭起来看,我们的体认更多地会倾向于对作家个人创新能力方面的肯定。然而,如果将其置于“思潮”视野,我们发现这些变化其实正是个人在“思潮”的整合过程中审美修辞的调整。风格变迁的主因原来在这里。再比如文学史的写作——在我看来,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纂而言,从大的方法论角度说不过两种形态:一是“纯审美”的文学史;一是“思潮”的文学史。“纯审美”的文学史关注的是每个时代的“审美进步”,并以这一进步作为对作家作品进行选择的基本标准。“思潮”的文学史,更多关心的是“有影响”的文学因素。有些作家或作品,就审美进步性看其实是没有资格进入文学史的,但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不能淡化或漠视的大的倾向性,所以在“思潮”的文学史中却是重

要的存在。实际的例子是很多的——“文革文学”在许多文学史中之所以被忽略，就是在有些研究者看来它不但不具备与“十七年文学”相比较的“审美进步性”，简直就是“审美的倒退”。然而在“思潮”的文学史中——比如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它却是需要认真分析的对象。20世纪文学史上属于这样的现象或作家作品为数不少——比如像胡适与《尝试集》、“革命加恋爱”创作、“红色鼓动诗”、30年代的通俗文学、解放区的“秧歌剧”、“十七年”的“工农兵”文学、“歌颂类”创作、小剧本创作、“文革”时期的“革命样板戏”、激进的“文艺评论”、八十年代的小说《伤痕》《班主任》，“将军诗”以及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论争，等等。被“纯审美”文学史认为没有意义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大量的文学现象，在“思潮”视野里却可以赢取价值，有些甚至是很重要的价值，这无疑是一种具有独特性的“叙述”才能达到的效果。显然，与作为一种“状态”的“文学思潮”相比，这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学思潮”的意义，更值得我们把握与研究。

注释：

- [1] 例如发行量很大的《文学理论教程》(重庆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朱立元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两套教材，均无关于“文学思潮”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即使个别的此类著述涉及这一问题，也多是在对其他问题的历史性考察中顺便提及。因为无法进一步展开，反倒使“文学思潮”的理论性方面更加复杂，例如苏联学者波斯彼洛夫所著《文学原理》(王忠琪 徐京安 张秉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三月版)。诚然，这里要特别提请注意美国著名文艺学学者沃伦·韦勒克。他在名著《文学理论》中也未正面涉及“文学思潮”，也许因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他专门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一书中进行了细致论述。
- [2] 严家炎《文学思潮研究的二三断想》《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5期。
- [3]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上、下)许志英 邹恬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

- [4]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等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 9 月。
- [5] 解志熙《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台湾燕智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
- [6] 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 20 世纪三十年代文学》 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类似的著述甚多,如,方维保《红色意义的生成——20 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接收与转化》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陈改玲《重建新文学史秩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 5 月;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等等。

目 录

绪论：“文学思潮”的“问题”与“意义” / 1

第一章 文学思潮的基本问题 / 1

第一节 “概念”历史与“命名”思维 / 1

第二节 “对象性”与“方法” / 14

第三节 文学思潮的“特性”之一 / 26

第四节 文学思潮的“特性”之二 / 40

第五节 文学思潮的“功能”与“影响” / 51

第二章 文学思潮与相关范畴 / 65

第一节 “文学思潮”与“创作思潮” / 65

第二节 “文学思潮”与“创作方法” / 78

第三节 “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 / 93

第四节 “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 107

第五节 文学思潮：作为“状态”“现象”“风格”与“时期”的不同形态 / 125

第三章 文学思潮的展开形态 / 143

第一节 “民族意识”和“大众意识”的凝铸——“国统区”文学思

文学思潮：
理论
方法
视野

潮的一种描述 / 143

第二节 “延安艺术理性”的生成与泛化——“解放区”文学思潮再考察 / 152

第三节 “政治审美化”的“纯粹”与“艰难”——“十七年”文学思潮的内在机制与理念走向 / 167

第四节 “历史”的“成长性”与“观念”的“层积性”——关于“文革”文学思潮的可能性描述 / 172

第五节 “新启蒙”时代的历史“延异”——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状态“复杂性”的思考与梳理 / 186

第四章 “思潮视野”里的“文学现象”考察 / 213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潮性”变化 / 213

第二节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状态之比较 / 226

第三节 当代“戏改”与“语境”的互动 / 235

第四节 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的赵树理及其相关问题 / 251

第五节 多元文化视域中赵树理“价值形象”的历史变迁 / 282

第六节 丁玲的“转换”与时代的“转折”——《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修辞”解析 / 301

第七节 语境制约下的“价值修辞”——巴金的“命名”与“命运” / 316

第八节 20世纪90年代前期小说审美主潮的一种分析 / 330

后 记 / 336

第一章 文学思潮的基本问题

第一节 “概念”历史与“命名”思维

有关“文学思潮”的概念界说,至今仍处于人言言殊的尴尬境地,由此所引起的文学思潮研究的“泛化”弊病长期以来难以根除。总体看来,迄今为止有关文学思潮的概念界说大致可以归纳为“创作本位论”“多元存在论”和“抽象外在论”三种。三类概念界说在范畴和逻辑架构上的不同,其实质是与研究主体“认知”模式的差异密切相关。深入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根源以及由此带来的“定义”歧异问题,是扭转文学思潮研究“泛化”局面的重要途径。

“文学思潮”作为一种“问题类型”和对有关文学的各类现象——包括“史性”现象、现状的现象等方面进行研究的“思维方式”,早在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学研究过程中已得到运用,这当然是与“破旧立新”的时代转折所需要的宏大思维格局取向存在着密切关系。不过,作为普遍使用的学术观察方式,严格来讲,在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大规模流行。粗览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思潮”研究的各类情形,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大量冠以“文学思潮”名义的研究著述,其绝大多数属于随意性很强的“文学现象类型”或“创作风尚类型”的一般性概括。此类成果不但难以成为这一阶段文学研究整体繁荣的标识性存在,反倒直接呈现了文学思潮研究被大大“泛化”的严重

后果。“文学思潮”作为一种“问题类型”和它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独特性的“文学研究叙述方式”，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不过，由于有关“文学思潮”的一些基本问题大都仍处于暧昧不明状态，比如文学思潮的“概念”问题、文学思潮的“学科性”问题，等等。因此，“文学思潮”常识范畴、指称界定、知识谱系及其思潮现象的历史、现状的模糊无状性，直接影响了整体性“文学思潮”研究的深入发展。展开对文学思潮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入的、追问式的研究，现在看来是非常必要的。

在我看来，“文学思潮”的研究，应当首先使其建立在“文学思潮”的“学科性”逐步被单列的基础之上，即尝试建构“思潮学”以及所隶属的“文学思潮学”。就我国目前的学科分类来看，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人文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其情形大致一致。从时间上看，我国有计划的实施“学科分类与研究”并且有意地加以细化，也还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其与改革开放的时间表基本吻合）。就“哲学社会科学”类而言，大约有包括马列社科、哲学、历史、经济理论、政治学、中国文学、教育等26个一级学科。由此我们看到，这些学科的确立或被作为“知识类型”，是以人类社会不同的“生活领域”“精神领域”或“机能特性”等各自不同性作为前提或基础的。实际上，“生活”或其“衍生因素”的“独特性”，既是“领域”的世界，又是“问题”的王国。描述“领域”世界的面貌和解答层出不穷的“问题”，就需要不同的“领域知识”。很显然，“领域问题”与“领域知识”是构成学科得以确立自身的两个重要方面。“领域”与“问题”的不断扩大与增加，所产生的重要结果就是不断催动和加快着“知识衍生”的速度——新“领域”和新“学科”就会不断增加。这可以认作是“知识”的生命增值或“知识”的领域扩张。

以上的简单讨论，有助于我们对“文学思潮”独立“学科性”的思考与认识。从“中国文学”这一“一级学科”及其所划分的几个“二级学科”来看，“文学思潮”很难说它当属于哪一个“二级学科”。

纵观新时期以来有关“文学思潮”的大量研究成果,我们能够发现已经出现了一些(但是不多)纯粹以“理论”方式对文学思潮进行研究的著述——这与过去只是描述“思潮状态”的研究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已越来越注意到了“文学思潮”的“理论意义”或“文学思潮”被“理论”开发的可能性,也呈现了新时期以来我国学术界“文学思潮”研究的展开与深入的轨迹。就“文学思潮”作为理论命题的研究而言,研究界基本上已经认同这样一些看法,即“文学思潮”的“存在方式”(在有的学者那里表述为“形态”“呈现方式”等),既有“理论”的形式,也有“运动”的“批评”的“创作”的“接受”等形式。如何看待“文学思潮”的“理论”的“存在形式”,过去一般只是把它理解为文学思潮以“理论”的方式表达或呈现自身,是指某种文学思潮被“理论化”的状态。这显然只是表面的、粗略的体认。我们认为,所谓的“文学思潮”的“理论化”,是把“文学思潮”作为抽象的具有学理性的理论命题——它有着关于自身的许多问题和需要对它们进行逻辑性说明的特定视阈及其特定方式。比如关于“文学思潮”的概念、文学思潮的立足范畴和特征性,文学思潮研究之于实践状态时所要遵循的观察方法、有关文学思潮类型认证的基本标准以及对“文学思潮”具体构成因素实施剔抉与分析的前提,等等。一如我们运用“文学理论”学科知识来分析具体的文学行为一样,即使像大多数人那样在过去只是把“文学思潮”当作对“现象”实施“命名”的方式,也总会遇到诸如“什么是文学思潮”等大量相关性的“概念”问题——而这些,需要凭借对“文学思潮”进行学理式的抽象研究才能解决。

(一)

文学思潮的“概念”问题,亦不外乎“内涵”与“外延”两部分。其“内涵”的确立,须对其所具有的“特性”与基本的“构成因素”属性进行分析;“外延”的划定,则主要是须厘清它与那些容易与自身发生“边界性”“构成性”等矛盾夹缠的相似性“家族”的分界线,比